

张翎:见证女性生命力量

□本报记者 张雪娇

6年前,海外华语作家张翎推出了“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劳燕》,睽违6年之久,第二部《归海》近日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归海》讲述了一对温州母女的故事,从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凤的视角出发,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在巨大的时间尺度上,张翎用细腻的笔触观照了个体的历史语境,书写了战争的创伤以及人对这一创伤的克服和超越。

有战争的感触才写就新作

《归海》借助一位中国普通母亲的身世传奇,拆解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编码。读者跟随女儿的足迹,与一个生命再度相逢——含辛茹苦的糙母亲、战斗英雄的好妻子、野战医院的军护士——我们就此辨识出一位女性不可言喻的苦难、泪水与创伤,并铭记下一位母亲的坚韧、智慧与勇敢。

很多人好奇,张翎的作品为什么与其他女性作家写的不是同一类题材?对此,张翎回应称,尽管她最广为人知的是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中篇小说《余震》,但她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事实上,自创作完成《余震》后,她从2007年起就开始关注灾难、战争、创伤的问题了。

这一创作倾向,与她的职业密切相关。

除了作家身份之外,张翎还是一位听力康复师,她在诊所工作了17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除了一些普通的老人之外,她还会接触到从各个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上世纪90年代初,她甚至能见到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再后来,她遇到越来越年轻的军人走进她的诊所。张翎说,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那些军人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可是,留在他们身上的创伤,她是亲眼所见。

这使张翎警觉,灾难本身是一个事件,有始有终。战争无论要经历多久,终究会有一个终点,但战争留下来的创伤无法用时间来界定,它就像油烟一样粘在身上,清洗不下来,甚至直到生命消逝,创伤还将在不经意间影响到子女。正是有关战争的感触和思考,才成就了《归海》这部作品。

写作环绕“水的意象”展开

张翎以中英文双语完成此次创作,她在分享小说命名的构思时说:“我不愿意别人说这是同一本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重写的故事,一个英文版,一个中文版。”

张翎解释,英文版名为《Where Waters Meet》,直译为“水相连的地方”或者“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我希望中文版和英文版要有契合的地方,那就是:水肯定要相遇的。”于是她将“水的意象”保留在书名中,而这个故事讲述的也是一位女儿与

母亲在走过千山万水之后的重逢,她们从温州出发,来到东海,来到黄浦江,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母亲是带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重返故乡,女儿是带着她的灵魂来归家的。最后,这部小说中文版书名确定为《归海》。

其实,张翎的写作中有着大量有关“水的意象”,《归海》也是环绕这一意象展开。

“为什么是水?”张翎认为,战争中,女性除了要承受战争灾难之外,她们还有一种独特的、属于女性自身的困境要承受。在她看来,男性的力量是有分贝的、有爆发力的,它是响亮的,这会让她想起钢铁、岩石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和男性不同,她笔下的女性像是“水”,极具环境适应力,用沉默默默承受命运。

张翎一直试图通过“水”来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在她看来,把女主人公形容成“水”,但她不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洁净如冰雪的水,而是泥水,能够滋养万物。她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全性命。因为母亲要保全儿女,她必须活下来。“在我看来,她是世界上最具有强悍生命力的人。我要向这样的女性致敬。”张翎如是说。

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式传奇”

《归海》在国内文学期刊发表时就引

发文学界关注,新书出版后,更是引来评论家热议。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吴义勤表示,这是一部标识张翎创作的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文学写作上,张翎的个人风格依然是细腻的、绵密的。在小说形式上,全书采取了对白与书信的结构。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主人公从加拿大回到温州,探访母亲的秘密,揭示尘封的真相,因此有一种心灵解密的艺术特征。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有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即战争的精神创伤的问题。

“中国文学界如何反思和书写战争,确实是对当代作家的一个重大考验。”吴义勤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归海》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的文本。“张翎从女性视角出发,从姊妹两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幸经历出发,探寻未来几十年心灵的挣扎与人性的救赎。与此同时,这部作品通过反省的视角,通过女儿寻找母亲的叙述角度,讲述这一段历史,从而揭示女性命运的奥妙。”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从治辰认为,张翎有一种尝试的勇气。“可以说,她的每一本书的主题以及处理方式,似乎都在给自己找麻烦。”从治辰说,《余震》《金山》《归海》完全是不同的风格,《归海》更写出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式传奇”,是作家又一次新的冒险。



张翎

海外华语作家,现居加拿大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等文学奖项。

姜小青:择一事就为之终一生

□本报记者 章红雨

与姜小青认识是在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多次相关会议上。作为古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他,每次都和同道将会议办得内容满满,让身为记者的我次次都有报道不完的“干货”。

对于姜小青的深度了解则是他的新书《诚斋文录》。虽然姜小青表示书的内容“乏善可陈”,但是古籍出版人却不这样认为。诚如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中国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岩在《诚斋文录》的序中所写:“凤凰出版社在小青兄手上能够跻身中华(中华书局)、上古(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后多年名列古籍社中第三名,有赖于他在高纪言、薛正兴(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两任社长)等前辈基础上的坚守与超越。”

坚守不易,超越更难。姜小青如何做到两者兼顾?《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以书为介采访了姜小青。

感人人生路上的恩师们

姜小青从事古籍出版始于1991年。1988年5月,从师毕业后当了4年省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几个月高校学报编辑的姜小青,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师从于维璋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回顾3年硕士研究生学习,姜小青感念师恩难忘。他说:“于维璋先生对我这样毫无学术基础的人,从第一学期指导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部书开

始,到《典论》《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逐一讲解,再到亲自选一些文献让我学习注释,并请董治安先生讲授两汉经学与文学、王培元先生讲授目录学,学习传统学术门径与方法。今天想起这些,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师恩难忘。”

在师恩情怀下,《诚斋文录》收入了姜小青撰写的几篇与人相关的文字。其中,怀念13年前去世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正兴先生的文字,以《沉思往事立残阳》为题,洋洋洒洒万余字,表达了姜小青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事感念之情。

姜小青回忆,薛正兴既长于编辑图书,又善于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型编辑”。薛正兴生前所倡导的以书立社,加强高学术水平古籍整理图书的开发与出版,对已启动的项目有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从而进一步扩大出版社特色与优势等理念,对他后来主持凤凰出版社工作时帮助很大。此文收入《诚斋文录》,不只是怀念前辈师友,更为主要的是,希望“学者型编辑”不要成为时代的“背影”。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总编辑至社长兼总编辑,姜小青在一个单位一个领域不间断地做了30年。从某种程度上讲,《诚斋文录》便是姜小青

古籍出版生涯中的所思所想所实践。

比如,在《对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姜小青的体会是:第一,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第二,摸索发展途径;第三,制定选题规划;第四,做好重点项目;第五,正确看待古籍出版“小众”问题。这些古籍出版人遇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用姜小青的话说,只有专业化,地方古籍出版社才有生存空间。

为此,姜小青向记者讲述了他主持凤凰出版社期间遇到的一件“大事”。原来,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时,有3/4人员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18人留在社里,是坚持原先的古籍出版还是另辟蹊径?一番求索之后,凤凰出版社决定“以最专业的做出最优秀的产品”作为发展之路。

实践证明,如今的凤凰出版社不仅有了发展空间和生存价值,还以众多优质出版项目居地方古籍出版社前列。

这件事让姜小青深刻体会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必要性。他认为,强化古籍出版专业能力,会使“小众”出版大有可为。他将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付梓书中,就是供后来者参考和借鉴。

作出退而不休选择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信念,让姜小青作出退而不休的选择。2021年,退休后的姜小青受组织信任,开始担任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专门主持出版《江苏文库》项目工作。

谈及出版总规模在3000册左右的《江苏文库》,姜小青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姜小青说,新编大型历史文献丛书不仅需要充分借鉴、利用、吸收前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成果,还需要今人不断地总结、完善与修正操作规程中遇到的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为少留一些遗憾,姜小青将《江苏文库》出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梳理并收入《诚斋文录》中。比如,如何处理好集体项目实施过程中统一性的问题?如何处理已有出版成果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出版质量与进度的问题?如何看待学术性与普及性的问题?如何统筹丛书出版与出版社选题规划的问题?如何将项目实施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实施项目数字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姜小青看来,貌似“很小”,实则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全局。

截至2022年年底,《江苏文库》出版至1002册,距离《江苏省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出版3000册左右的目标还有2/3的工作要做。对此姜小青表示:“‘择一事,终一生。’身为江苏古籍出版人,应有一份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扎实走好今后的每一步才是做好古籍出版工作的关键。”

我们由此相信,《诚斋文录》或许还会有后续。



姜小青

凤凰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任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出版了《全元文》《册府元龟》《文选旧注辑存》《江苏文库》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著有《诚斋文录》,选注《新编宋词一百首》、点校《吴越访古录》等。

徐锦庚:倾力为普通人立传

□本报记者 张雪娇

昂扬不屈的挑山工、乡村儒学的坚守者、农村电商的领路人、心怀大爱的援藏干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徐锦庚创作的短篇报告文学精选《行走的脊梁》,日前由济南出版社出版。

在徐锦庚笔下,书中的普通人物鲜活、生动,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都有着大大的情怀。这是徐锦庚写作《行走的脊梁》一书的初衷——为普通人物立传,彰显人性光辉。

挖掘普通人物闪光点

《行走的脊梁》选取了徐锦庚20篇短篇报告文学精品,用细腻的文字书写大时代下普通人物身上的故事,挖掘人物身上的闪光点,用文学渲染的手法讲述真人真事,回答时代之问,传递蓬勃生长的中国力量。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黄传会评价这部作品说,该书关注农民、工人、售票员、厨师、消防队员等普通人物,却人人都有大情怀;篇幅不长,却篇篇都有大气象。作者从时代大潮中

撷取涓涓细流,以小见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当代中国精神,既给人以感官愉悦、艺术享受,又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励。

为何会关注这些普通人物?这与徐锦庚的记者职业有关,他接触的既有业界翘楚和社会精英,也有普通百姓。“他们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也是我新闻报道中的主角。”徐锦庚表示,非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非凡事,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目标。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他有意识地瞄准老百姓,倾力为普通人物立传,让他们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

那么,哪些普通人物能够成为徐锦庚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呢?他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能让他怦然心动的人或事。

在徐锦庚笔下,普通人物个个都有大情怀。比如《“懒汉”治村》中的村干部,办事公正公平,科学决策,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践行的是我党的初心;又如《芝麻开门》中的农村电工,做电商开网店带动一方经济,让乡亲们脱贫致富,见证了“网络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可见,普通人物同样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中国需要渊子崖”

阅读完《行走的脊梁》一书后,记者对《一个村庄的抗战》中的细节久久不能忘怀。该章节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渊子崖全村老少与敌人拼死肉搏、保家卫国的故事。徐锦庚以饱含敬意的笔墨,将那场昏天黑地的血战讲述得惊心动魄。

军人出身的徐锦庚对战争格外敏感,对激发民族气节的战争格外看重。“第一次听到渊子崖,我被一组数字震惊:全村人与日军真刀真枪干,140多人被杀,日伪军死伤150多人。”徐锦庚也为一个事实起敬:激战之后,鬼子要么绕道走,要么路过时会向村子和村民敬礼。一一惊一敬,让他血脉偾张、情不能已。于是,徐锦庚怀着敬仰之心,慕名前往,寻寻觅觅,感慨万端,徐锦庚表示,“中国需要渊子崖,中国需要血性。”

感受温暖与力量

通过阅读《行走的脊梁》,我们可以跟着作者走进神州大地深处,置身刘集村民舍生死接力保护《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现

场,景仰渊子崖村民奋勇抗日的民族气节,触摸龙山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根脉……书中每篇作品都像老友在讲故事一样,也可看出,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正能量的。

对此,徐锦庚表示,他对报告文学社会职能的理解是8个字:弘扬正气,鞭挞时弊。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既要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更要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在他看来,报告文学当然要针砭时弊、揭露批判,但更要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时代风气,引领时代风尚,传播崇高、正义、公理、奉献、友爱、善良,让读者感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行走的脊梁》运用了大量的短句,读起来铿锵有力,气势恢宏。对此,徐锦庚介绍,在写短篇时,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一是通篇短句,字不逾十;二是灵动活泼,富有弹性;三是筋骨耐嚼,富有张力;四是抑扬顿挫,富有韵律。对于为什么要用短句?徐锦庚的体会是,文章要讲气势,气势既要体现在主题上,也要体现在语言上。主题是核心,语言是载体。再好的主题,如果词不达意、信屈整牙,气势就会大打折扣。而短句读来节奏分明、铿锵有力,能够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



徐锦庚

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出版有《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台儿庄涅槃》《大器晚成》《洞溪春晓》《望道》等长篇报告文学。